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郭素美 王希亮

内容提要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文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日本教科书问题

去年4月3日,日本教科书审定机关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敞开了绿灯。无独有偶,今年4月9日,教科书审定机关又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明成社出版的《最新日本史》。那么,“日本会议”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最新日本史》又是一部什么样的教科书,“日本会议”与“编纂会”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试图予以揭示和论述。

一 80年代教科书风波的始作俑者

战后以来,日本朝野上下的右翼势力先后掀起了三次攻击教

教科书的逆流。第一次是在1955年,民主党(自民党前身)发行了一本题为《令人忧虑的教科书》的小册子,向国会提出一个“教科书法案”和“新教育委员会法案”,蓄意恢复战前的教育制度。由于当时正值日本恢复经济建设时期,加之日本国民对经历过的战争记忆犹新,对日本走回头路的警惕性甚高,因此指责民主党“倒行逆施”,民主党的意图未能得逞。

1982年7月,铃木内阁教科书审定机关,将1983年高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对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也进行了淡化处理,引起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和反对,日本国内也掀起抨击日本政府及有关当局的浪潮。日本现代史称“第二次攻击教科书逆流”,这也是80年代教科书风波的序曲。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日本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代表政府发表了谈话,表示“在记述我国同中国、韩国等亚洲近邻诸国的关系时,鉴于过去的不幸关系,应该考虑到诸国的国民感情”。这就是后来附加在教科书审定基准内的“近邻诸国条款”,表示日本政府在以后审定教科书时,一定要遵循这个条款。这样,事件才稍有平息。

然而不出4年,1986年5月27日。日本教科书审定机关竟然无视本国自定的“近邻诸国条款”,通过了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以下简称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这又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批判。

“国民会议”就是“日本会议”的前身,成立于1981年10月27日,是由文化、教育界右翼学者、教师以及财界、宗教界人士组成,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议长。该会主张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建立军队,海外派兵,实现“集团自卫权”等。老牌的右翼团体生长之家、胜共联合、神社本厅等都汇于它的旗下,并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起“县民会议”,作为下属支部展开活动。

1983年12月,“国民会议”决定着手编写教科书,为此成立了

有 30 余人组成的编纂委员会,其中多数是文化教育界右翼团体“日本教师会”、“教科书正常化国民会议”、“朱光会”、“天皇在位 60 年奉祝会”的发起人或骨干成员,如稻川诚一、小堀桂一郎、村松刚、结城睦郎、山口康助、坂本夏男、宫田正彦、小笠原春夫等。还有一些人是原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官员,如“编纂者”之一的朝比奈正幸是原文部省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委员,而“监修者”村尾次郎则是原文部省日本史教科书主任调查官(此人从 1956 年到 1979 年一直担任该职,家永三郎的日本历史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即在该人当职期间)。另一名“编纂者”山口康助,也是当时的调查官,他们对排斥家永教科书,审定其为“不合格”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监修者”和“编纂者”们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了。

编纂委员会成立后,他们确定了几条编纂方针:“古代史部分,不仅仅利用考古资料,而要通过神话使学生们理解日本的建国”;“要培养对皇家的敬意”;“在近现代史上不能把日本片面地写成是加害者”。^①

“国民会议”的教科书获得通过后,《朝日新闻》立即发表评论,指出该教科书“是改宪派编写的教科书”,“在教科书中礼赞教育敕语”,是“复古味道的日本史”,并提出其中有 800 多处错误或需要修改的问题。^②接着,中国、韩国、朝鲜都发表了严厉的批判文章或讲话,指出,“遗憾的是日本的文部省再次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于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的任何言论、行动,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断然反对”。中国政府还正式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日本方面“必须严肃处理

① [日]堀幸雄:《战后の右翼势力》,劲草书房 1993 年版,第 257 页。

② [日]《朝日新闻》1986 年 5 月 28 日。

这个问题,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纠正错误的内容”。^①

在国内外的强烈呼吁下,1986年5月30日,为了掩世人耳目,文部省对该教科书提出了约300余处的修改要求。6月10日,又就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提出6处修改要求。6月27日,再次提出68处的修改要求。但是,因为该教科书是从根本上歪曲历史,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如果不彻底纠正其指导思想和编纂方针,无论如何修改也无济于事。

对文部省的修改要求,“国民会议”于7月1日召开“紧急运营委员会”,会议认为“教科书是件大事”,决定“断然拒绝”修改,并于7月3日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意见。这以后,由“监修者”村尾次郎出面与文部省交涉、斡旋和协调,经过讨价还价和部分修改,7月7日,文部省最后批准该教科书“合格”。而该书中关于“天皇神格化”问题、“大东亚战争”的表述问题以及对亚洲诸国的加害问题等,仍继续坚持编纂者原来的意见。7月8日,“国民会议”运营委员长黛敏郎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我们的运动是以修改宪法为终极目的,发行教科书是其中的重要一环”。^②对于“国民会议”教科书的审定合格,7月16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严正表明:“教科书的基调是隐瞒和遮盖侵略战争,中国方面碍难满意。”^③

1986年6月6日,《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该教科书“从整体看,如同战前的教科书一样。对于战争,尽可能不表述日本的加害性,教科书中体现了主张掀起纠偏教科书运动的人们的意见”,“围绕着这样复古的教科书出台,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隐患。第一,在教育领域里,带有如此露骨意识的例子前所未有,印下了时

① [日]《朝日新闻》1986年6月5日;1986年6月10日(晚刊)。

② [日]掘幸雄:《战后の右翼势力》,第260页。

③ [日]《朝日新闻》1986年7月17日。

代错误的印象；第二，不吸收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对带来置疑的教科书文部省竟予以审定通过，同审定其他教科书对比，文部省的态度岂不是实行双重标准吗，敢于让这样的教科书合格，难道不该追究文部省的责任吗；第三，教科书‘本国中心主义’的基调，应该是我教育必须克服的对象，现代的日本应从战争的反省出发，应该教育的是战争的伤痛，失去这个基本点，历史教育就不能成立。利用这样的教科书与现代的教育观相违背”。^①

二 “日本会议”与“编纂会”一脉相承

1997年5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改称“日本会议”，由原日本最高裁判所所长（相当最高法院院长）三好达出任会长。在其成员名单里，我们发现，许多“编纂会”的要员也在“日本会议”里占有一席之地，如“编纂会”副会长高桥史郎，昭和史研究所代表人物中村粲，“国民会议”《新编日本史》执笔者之一的小掘桂一郎，以及“编纂会”骨干成员江藤淳（已逝）、入江八洋、中川八洋、加濑英明、板垣正（A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子，自民党靖国关系三协议会事务局长）、出云井晶（作家，积极主张进行神话教育，曾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发表过这类文章）等人，他们既是“编纂会”成员，又是“日本会议”成员，甚至是骨干成员。其中，“编纂会”副会长、“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高桥史郎还是中曾根内阁“临时教育审议会”的专职委员，其人从学生时代就加入右翼宗教团体“生长之家”，而“生长之家”就是“国民会议”的加盟团体之一。^②小掘桂

① [日]《每日新闻》1986年6月6日。

② [日] 俵义文：《新しい历史教科书をつくる会右派人脉》，载《世界》，岩波书店2001年第6期。

一郎曾参与编写《新编日本史》，又是“日本会议”和“编纂会”的成员，此人一直对战后教科书持批判态度，称“日本现行的教科书如同敌国编写的反日宣传品的翻译件，是造成社会破局的最大责任者”。^①可见，“日本会议”与“编纂会”两个团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穿着一条连裆裤。

另外，在编写方针和历史观上，“日本会议”（国民会议）和“编纂会”也惊人的一致。他们都强调“神话教育”，推崇天皇主义，宣扬日本历史上的“光辉”，否定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日本会议”认为，“由于东京审判史观的蔓延，招致向外国卑躬屈膝的谢罪外交，使担负下一代的青少年丧失对祖国的自豪和自信”，“轻视先人培育的传统文化，忘记和侮辱具有光辉的历史，丧失保卫国家和社会公益的精神”。^②“编纂会”也主张彻底粉碎“东京审判史观的束缚”，抨击“战后的历史教育，是让日本人忘记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失去日本人的自豪”。^③

在社会各界对两部教科书的评价上，“国民会议”的《新编日本史》被称作“带有复古味道的教科书”、“天皇的教科书”和“皇国主义史观教科书”。而“编纂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则被认为是（战时）“日本国史的复活”。^④两者如同难兄难弟，血脉相连。

去年4月，“编纂会”教科书被审定合格后，为了造成声势，提高采用率，“日本会议”利用它的势力和各基层支部与“编纂会”等团体联合组成“制定新教育基本法会”和“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号称结成“统一战线”，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展开了大规模

① [日]吉田裕：《现代历史学と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97年版，第126页。

② 网页下载：www.nipponkaigi.org。

③ [日]《周刊金曜日》1996年12月3日。

④ 今井勉：《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思考》，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的教科书采用促进运动,可见,他们攻击教科书的行动也是统一而且是有组织的。

综上所述,两个团体只有成立前后之分,没有思维观念之别。前一个团体制造了80年代教科书风波,无疑为“编纂会”提供了借鉴;“编纂会”则充当了第三次攻击教科书的主将,又抛出《新历史教科书》,“继承”了“国民会议”的“未尽事业”。换句话说,“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新编日本史》是“编纂会”《新历史教科书》的“先行版”,而“编纂会”的教科书则是《新编日本史》的继续和发展。到今天,他们的位置又发生颠倒,“日本会议”冲上前台,抛出《最新日本史》,试图取代去年在采用中遭到惨败的《新历史教科书》,再次抢滩教育现场,企图把他们的战争观和皇国主义史观强制灌输到青少年的心中。

三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促动反动教科书的出台

去年,“编纂会”教科书的风波尚未平息,如今,“日本会议”的《最新日本史》又获得日本有关当局的审定通过。人们有理由要问:为什么日本政界一面声称要与中、韩等国家致力于“历史共识”,一面又三番两次的为篡改和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大开绿灯呢?联想今年短短几个月来日本政坛耐人寻味的动向:诸如小泉首相继去年“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后再次迈进靖国神社,引起右翼的一片喝彩;自民党议员改宪声浪逐高,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议题已经纳入日程;以及关联“紧急事态法”的三法案的出台,小泽一郎关于发展核武器的“放言”等等,都告诉人们不能不警惕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正在一步步地加剧。

自1982年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以来,日本开始步入一条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的新保守主义路线。而模糊战争性质、淡化战争

罪行、推卸战争责任,从而恢复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重振“大和民族”昔日的“雄风”,则是这条新保守主义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曾根本人就曾强调,“日本战后受太平洋战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的毒害”^①,首次提出“东京审判史观”的概念。他还主张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并成为战后第一位“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总理大臣。这以后,中曾根的继承者们几乎毫无疑问地继承了他的衣钵,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执政的自民党内,一部分政治家、议员公开成立起各类右派组织。如“遗族议员协议会”、“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协议会”、“奉答英灵议员协议会”、“光明日本议员联盟”、“考虑日本前途和教育青年议员会”等,就是本文提到的“日本会议”,也有自民党议员公然加入,组成一个“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自民党的头面人物如竹下登、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人都在上述团体担任过重要职务。这些自民党议员右派团体几乎都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观点,1995年8月,以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名义编写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他们战争观和历史观的最真实体现。而其中大多数执笔者是“日本会议”、“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昭和史研究所”、“正论会”及后来的“编纂会”的成员。

为了把“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灌输到下一代青少年学生的脑海里,从教科书入手,展开“教育改革”,强化教科书审定制度,推进教科书的改恶运动,是日本当局推行新保守主义路线的重要一环。早在中曾根内阁时期,就把“教育改革”列为内阁的三大任务之一,1984年2月6日,中曾根在国会上提出“教育改革的视点”,并着重强调此次教育改革是“明治以来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

^① [日]五十岚武士、北冈伸一:《争论·东京审判とは何だったのか》,筑地书馆1997年版,第184页。

意义的转折点”。^① 他之所以把教育改革看得如此重要,就是要求教育必须立足于“转变国民意识”,“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而且,这种自信“必须从理解传统体制和历史开始”。^② 为此,中曾根内阁于1984年8月21日成立一个“临时教育审议会”,作为内阁教育改革的咨询机关,该会最后达成了共识,即“基础知识教育”必须以“日本民族光荣的历史为主要内容”,应该“唤起爱国心,强制日之丸、君之代”等。^③ 所以,在中曾根任上,“教科书的审定制度被重新强化”,“日之丸、君之代实施义务化”,“至少,中曾根对如何在孩子们中形成新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寄予了强烈的关心”。^④

正是因为中曾根内阁对“教育改革”的鼓噪,他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才有恃无恐,成为日本战后史上“失言大臣”的第一人。1986年7月25日,在“国民会议”的《新编日本史》获得通过后不出两周,面对世界舆论的谴责,藤尾正行对记者说,“东京审判是否有客观性,在于胜者是否有审判败者的权力,如果说世界史是战争的历史的话,那就应该(对胜败方)都进行审判,而且必须以一个同样的基准审判”。又抨击中韩等国对《新编日本史》的批判是干涉日本的“内政”,声称“在世界史上,从来没有他国对别国的教科书提出疑义”。藤尾的发言立即遭到亚洲各国的强烈抗议,指责藤尾“对周边国家发表侮辱般的语言,日本政府应正式道歉和谢罪”。可是,藤尾对邻国的抗议不仅称“没有谢罪的理由”,而且索性越发大放厥词起来。在各种公开场合说什么“官方参拜靖国神社是正

① [日]世界和平研究所:《中曾根内阁史》,世界和平研究所1995年版,第693页。

② 倍利:《日本的问题》(中译本),台湾金禾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07、108页。

③ [日]渡边治:《政治改革と宪法改正——中曾根康弘から小泽一郎へ》,青木书店1996年版,第325页。

④ 同上书,第330页。

确的,必须订正只有日本是侵略(国)的错误的历史观”;“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的根子都在于东京审判”,“南京事件和原子弹轰炸(广岛)哪个规模大?所以,必须要重新考虑东京审判的性质和意义”;“日韩合并是基于伊藤博文和高宗的协议进行的,也许这个协议是在压力之下,但是,我认为韩国方面也有责任,如果不合并,能保证清国和俄罗斯不向朝鲜半岛伸手吗”;“战争责任究竟是什么,是开战责任,还是败战责任,如果是败战责任应由(日本)国内审判,对外或支付赔款,或割地。因(靖国神社)合祀A级战犯就制止官方参拜,这是后来提出的理由,问题在于如何认识A级战犯”等等。^①

身居政府高位的藤尾正行毫不负责任地大放厥词,令世人瞠目结舌,理所当然地遭到国内外的严重抗议和声讨。9月8日,中曾根内阁不得不罢免了藤尾正行的文部大臣之职,这在日本战后史上,是继1953年农业大臣广川弘禅被罢免后的第二个内阁大臣(广川因反对吉田茂而被革职)。

再看日本政要对“编纂会”教科书的偏袒和支持,因为时不过一年,人们更是记忆犹新。当世人指出“编纂会”教科书的错误和荒谬时,政府有关部门不仅给编写者三次修改机会,还把审定时间延后了一个月,这是其他任何编辑出版部门不能得到的礼遇。当教科书审定合格后,文部科学大臣町村信孝不顾中、韩和国内各界的抗议呼声,一再发表讲话,声称“编纂会”的教科书是“经过有自信的审定,不能推翻它”,“碍难进行修正”。^②小泉内阁的文部科学大臣远山敦子也表示“不考虑修正”。^③

① [日]堀幸雄:《战后の右翼势力》,第363-364页。

② [日]《产经新闻》2001年4月13日。

③ [日]《产经新闻》2001年7月10日。

当“编纂会”教科书受到社会各界以及教育部门的抵制时，一些右派政治家们纷纷为“编纂会”教科书能摆到学校课堂而大肆活动。石原慎太郎不止一次地呼吁，“要确保教科书采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①；自民党政调会长麻生太郎也强调“要考虑采用的公正”^②；自民党文部科学部会和文教制度调查会则发表声明：“教科书的选用权在各教育委员会，应该由其自主判断，可是，近来围绕教科书选用的政治动向堪称忧虑，虽说表明对教科书的见解是基本自由，但是施加政治压力，影响选用者的判断，有损于公正，断不能允许，为此，我们要求有关人等万勿影响教科书的公正选用，慎重约束自己的活动。同时，我们也要求负有选用之责的教育委员会要认识到选用教科书的重大责任，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 and 影响，以自己的判断和责任公正、中立、適切地选用教科书。”^③最近，日本的自民、自由、民主、保守党部分议员还组成一个“考虑历史教科书问题超党派会”，他们的立场明显站在“编纂会”一边，对日韩学者共同研究历史问题、求得共识大唱反调。2001年12月5日，该会决议，主张“应该调整日韩两国关于历史认识的共同研究方向，反对外务省等政府机构对教科书问题予以干预”等。^④

可见，日本部分政要战争观和历史观的荒谬，派生出“教育改革”的滥觞，又直接影响到教科书的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行动更成为反动教科书出台的催化剂。

还应该指出，“日本会议”的《最新日本史》的出台，再明白不过的说明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去年，尽管“编纂会”教科书出

① [日]《产经新闻》2001年4月13日。

② [日]《产经新闻》2001年8月29日。

③ [日]《产经新闻》2001年5月26日。

④ [日]《产经新闻》2001年12月6日。

笼后遭到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其采用率仅达到 0.039%。但是,截止 2001 年 10 月,“编纂会”的教科书已经再版 7 次,发行达 60 余万册。另据《产经新闻》的民意调查称,在 1275 名被调查者中,赞成“编纂会”教科书的人数有 1062 人,占 82% 以上,反对者为 73 人,仅为 0.057% 左右,另有 140 人未置可否。该报洋洋得意地称,民意测验的结果说明(对“编纂会”的教科书)“并非象一般媒体宣扬的那样,是清一色的批判声,而多是激励的声音”,“莫若说赞成的意见和激励的声音居多”。^①另外,为了扩大发行量,扶桑社决定,凡购买该书 20 册以上者给与 20% 的折价优惠。不难看出,“编纂会”的教科书虽然遭到日本社会的强有力抵制,直接投入到教育现场的数量并不大,但是,这套教科书的发行量及流入社会的数量却很大,所带来的潜在的负面影响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另外,今年“退居二线”的“编纂会”也没有偃旗息鼓。2001 年 8 月 16 日,“编纂会”的头面人物西尾干二扬言,今后“将考虑为日本学校撰写更多的教科书,以便在学生中灌输民族自豪感”,“我们不会放弃让公立学校也使用有争议教科书的尝试”,“目前的小学社会科学教科书有些问题。我们正考虑编写新的社会科学教科书”。^②也就是说,“编纂会”正在着手或者酝酿编写小学的教科书。两个团体“轮番作战”,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十分明显,万万不可小觑。更不能忽略的是,“编纂会”以及“日本会议”的成员里多数是教育或文化工作者,直接活跃在教育或舆论现场,对青少年以及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提醒人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① [日]《产经新闻》2001 年 9 月 3 日。

② 《中国日报》2001 年 8 月 16 日。

四 《最新日本史》的反动和荒谬

1986年,“国民会议”的《新编日本史》获得通过由原书房出版后,因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其采用率更惨,最多时也不过0.01%。1995年,原书房将版权转让给国书刊行会,更名《最新日本史》,依然是难以回天,被教育部门采用的数字始终徘徊在一两千册之间,2002年采用该教科书的学校不过有国立1所、公立3所、私立11所。今年,《最新日本史》改由“日本会议”的下属出版机构明成社出版,内容没有大的变动,包括封面设计都没有变化,不过是国书刊行会的改订版。

《最新日本史》把日本的历史分成古代、中世、近世和近现代四个时期,以下根据国书刊行会的版本仅就其近现代部分简要剖析:

(一) 全文刊载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

同“编纂会”的教科书一样,《最新日本史》全文刊载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称“这表明了传统的国家观和人伦道德融合的国民道德”,教育国民“忠孝、博爱、修学、遵法、义勇奉公”,因此“被翻译成英、德、法、中文向海外介绍”等。^①人们还记得,日本前首相森喜朗鼓吹“神国论”之时,不厌其烦地大讲特讲“教育敕语”,要求国民“义勇奉公”,可见“教育敕语”同皇国主义史观是休戚相关的。

(二) 对日本近代以来发动的侵略战争,通篇不提“侵略”二字。

在这部教科书里,从明治初期日本对台湾、朝鲜的侵略,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偷袭珍珠港,凡日本对外进行的战争,通篇不见“侵略”二字。换句话说,教科书的编纂者们根本不承认日本对

^① [日]朝比奈正幸、小堀桂一郎、村松刚等9人著,坂本秀俊等4人“编修协力”:《最新日本史》,国书刊行会2001年1月31日版,第20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而且,教科书明确规定,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大东亚战争”,并在注解中明确指出:“战争的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大东亚会议”、“大东亚宣言”、“大东亚新秩序建设方针”,强调“1943年缅甸、菲律宾获得了独立”,“印度建立了自由的印度临时政府”等(第235页),公然把侵略战争美化成“自存自卫战争”和“亚洲解放战争”。

(三) 把战争责任推给对方。

如1875年日本发动的江华岛事件,教科书称,“日本军舰在江华岛海域进行包括示威行动在内的测量时,受到朝鲜炮台的炮击,日本方面也加入炮击”。(第176页)对甲午战争,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日本不失时机的(对朝鲜)派兵,使反乱被镇压,日清两国围绕朝鲜的内政改革产生尖锐的对立,日本决意将清国的势力从朝鲜一扫”。(第190—191页)日俄战争是“俄国无视日本的撤兵要求,屯兵满洲,桂太郎内阁为避免冲突决定以外交手段继续交涉,另一方面进行开战准备,到1904年2月,交涉终于破裂,我国进入与俄国的交战状态”。(第195页)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中的一部分人独断地将柳条湖附近的铁路爆破……若槻内阁表明不扩大方针,关东军无视这一方针,走向扩大事变的道路,同时,关东军的行动也受到舆论的支持”。(第225页)对日本发动的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全面侵华战争,教科书称作“日华事变? 日中战争”,而“日华事变”则用黑体字突出,内中说,“在卢沟桥附近,日中两国军队突然冲突,近卫内阁提出不扩大方针,在现场签订了一时停战的协定,7月末,政府下达内地师团的动员令,两军冲突扩大……近卫内阁摸索早期停战,通过德国交涉,但未能抑制战火”。(第230页)这里的“突然冲突”,不过是卢沟桥事变“偶发说”的翻版,还是为了推卸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另外,在教科书的行文中,多处把战争责任归结于被侵略国家

的“反日”，如“中国对日感情极度恶化”、“排日运动高涨”、“在满洲反日运动激化，当地的日本侨民和权益不断遭到伤害”等等。

(四) 美化殖民统治、掩盖战争犯罪。

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教科书记述道，“关东军致力于新国家的建立，宣布建立了以日、朝、满、蒙、汉诸民族协力为理想的满洲国”。（第 225 页）

另外，在这部教科书中，对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地犯下的战争罪行完全持回避或否定态度，如“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七三一细菌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罪行、实施毒气战、三光作战等，教科书中连类似字样也没有出现，暴露出编纂者们完全否认日本战争犯罪的真实意图所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教科书正文中也没有涉及，只是在注释里称作“南京事件”，浮皮潦草地提到，“南京陷落后的混乱之际，多数中国士兵和市民因日本军而牺牲，受到国际的非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等。（第 231 页）

(五) 否认东京审判。

教科书正文对东京审判只是轻描淡写地记述了审判的结果，另以注释形式，用较大的篇幅标为“东京审判遗留的问题”。内中引用印度法官帕尔的话，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条例”是“事后法”，（帕尔认为）“全被告无罪”，“对和平有罪是新导入的法理”，（辩护团）“指出其不当，但被裁判所驳回”，“东京审判有负的一面”等等。（第 241 页）

(六) 鼓吹修改宪法，煽动收回“固有领土”。

教科书最后一章署名为“现代日本的课题和文化创造”，这是此次明成社版本临时增补的部分。原版本对修改宪法是这样表述的，（海湾战争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国该如何做出贡献，引起人们的关心，为了适应现实，在各界活跃地展开了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议论”。（第 254 页）而此次明成社的版本则公开宣扬日本正在

遭受他国的“威胁”，进而强调修改和平宪法的“必要性”，主张通过再军备收回“固有领土”。书中称，“我国固有领土受他国威胁是不容忽略的现实，北方领土依然被俄罗斯占领，韩国对岛根县的竹岛，中国对冲绳的尖阁列岛都主张领有权”，其煽动再军备、主张武力征服一切的意图跃然纸上。

(七) 其他。

由于编纂者的指导思想是为了美化“大东亚战争”，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进而激发日本民族的“自豪感”，所以，教科书中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问题处处可见。如出兵山东是为了“保护在留邦人”；“二十一条”是“为了保全日本在满洲、内蒙的权益”；“巨额的政治性西原借款，扩大了段琪瑞政府的影响力”；“苏联单方面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北朝鲜、南库页岛”；由于“天皇圣断战争终结”等等，不一而足。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也流露出编纂者的“台湾情结”，如在记述中日恢复邦交后又特意附上一笔：“日本虽然与台湾(中华民国——原文)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继续进行”(第252页)，其真实意图不言而喻。教科书还蓄意渲染日本各界对战争的支持或效命，如对“学徒出阵”、“女子挺身队”、“神风队”的记述，对战死者家书的全文收录等，这不过是为了鼓励青少年学习战争一代为天皇献身的精神。

综上所述，“日本会议”的《最新日本史》同“编纂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如出一辙，是一部篡改历史、否认侵略、鼓吹天皇史观、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教科书，如果任这样的教科书流入社会、流入学校、流入日本青少年一代的手中，其后果可想而知。

(作者郭素美，1950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室主任；

王希亮，1946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